



刘家庄位于朱龙河畔，山岭环抱，自古以来盛行习武。抗日战争爆发后，各方势力抢占地盘，鱼肉百姓。日寇与汉奸整日“扫荡”“清乡”，在村中设立据点，催逼给养，虐待百姓，灾荒年也没放过。许多村庄变成了废墟、瓦砾场，荒无人烟。



日寇进犯百姓苦不堪言

荆山旁朱龙河畔 小村庄盛行习武

《魏书·地形志》载：姑幕县有荆台山。姑幕县在何处？据《读史方輿纪要》载：莒州东北百六十里有姑幕故城，古为蒲姑氏国，汉置姑幕县。《重修莒志》载：姑幕城，为石埠子之古城。

20世纪40年代前后，荆台山属于安丘县的石埠子镇。荆台山，又名荆山，山颠有凤凰石，据说凤凰东南飞时曾在此栖息。它位于诸城西北20公里，在石桥子村西南公5里，今属于诸城市石桥子镇，是荆河的发源地。《水经·潍水注》：“潍水又北径平昌县故城东，荆水注之，水出县南荆山阜。”

在荆山东侧，有一条小河，叫朱龙河。河床不大，却常年淙淙流淌。明洪武年间，随着人口大迁移，一户刘姓人家从山西洪洞县大槐树下迁移至此，依山傍河而居，繁衍成一座村落，名刘家庄。刘家庄山岭环抱，西南紧靠荆山，正西是小黄山，西北稍远是晏驾山，东面是花园岭。小黄山与荆山树茂林密、荆棘丛生，有狼、野猪等野生动物出没，还时常下山侵扰村民，村民群起抗击，逐渐练就了抗击野兽的本领，养成了打猎习武的习惯。

每至冬闲，村民三五成群上山围猎，若捕获野兔、山鸡，亲朋好友聚而食之；若捕到豺狼、野猪等大型野物，就全村人一起庆贺，如同重大节日。农闲之际，村民聚在场院里，练枪习武，切磋技艺。或把萝卜扔向空中，看谁能一枪击中；或到树林里比赛打麻雀、野兔。每年秋末冬初，村民得空了，就在村里设擂台比武与枪法。因此，村民几乎人人会弄拳舞棒，练就一手好枪法，家家户户都有土炮、鸟枪。刘家庄虽然村小、地处偏僻，村民却生活得悠然自得，日子太平祥和。人们还在村子四周修筑了围墙，围墙的四个角都有炮楼，东西围墙各设两个大门。



刘家庄。



朱龙河。

日寇汉奸设据点 搜刮折磨老百姓

宋戈庄在刘家庄西南不远处。日寇在宋戈庄设据点后，张步云二师的一个团也驻进刘家庄。从此，刘家庄陷入暗无天日的境地。百姓除缴纳各种捐税，还要白天给汉奸听差送信，晚上给他们站岗看门，整天忍饥挨饿，挨打受骂。

1943年天气大旱，几乎绝收，汉奸还是让伪保长逼百姓缴纳给养。刘洪明家只打了几十斤麦子，交不起给养，伪保长带领几个汉奸气势汹汹地闯进他家，见一家人正在喝稀饭，就一脚踢翻桌子，把刘洪明的父亲拉到村北毒打一顿，说家里明明有吃的还不交粮，是哄骗抗日救国军。

村里的刘德乾也因家里交不上给养，被汉奸绑到程戈庄据点，吊在梁上打一阵放下来，再吊上去打，折磨了半个多月，被打得皮开肉绽，奄奄一息。

村民刘德臣每隔一晚上，就被抓差到17公里外的相州去给鬼子送一趟联络信，不是挨骂就是挨打。在一个寒冬腊月的夜晚，他到相州送信回来后，又累又冷，当天晚上病倒了。第二天晚上，村保长又派他去送信，由于病得厉害，躺在炕上实在去不了。但保长却认为刘德臣是故意推辞，不听他指派，于是怀恨在心。

一天，保长让刘德臣到团部听差，晚上给军需长烧火暖炕。干完活后，刘德臣刚到家就被汉奸抓走了，说他把军需长的被褥烧坏了，把他打得死去活来，还要他赔偿84元现大洋，限一天内交上。第二天，刘德臣没能按时交钱，于是又被拖到刘保三家吊在树上毒打一顿，汉奸扬言要将他拖到石桥子活埋。刘妻苦苦哀求，又挨家挨户借钱，凑齐84元现大洋，刘德臣才被放回。

村民的冤屈和仇恨罄竹难书。原本平静安详的小村庄变得鸡犬不宁、民不聊生。朱龙河水也失去了它淙淙的欢唱声，取而代之的是村民向苍天绵绵不绝的呜咽声……

战火肆虐村民逃荒 诸城西北几成无人区

1937年七七事变后，日本侵略者全面侵华，到处战火纷飞，刘家庄也难以独善其身。

1938年2月，日本侵略者的黑手伸到了诸城的土地，诸城人民开始遭受残酷的压迫与蹂躏。当地国民党、地主乡绅、区长乡长，以及土匪流寇，都趁机拉起武装，名为抗日救国，实则抢占地盘，鱼肉百姓，他们吆喝去“抗日”“牵鬼子”，实际上是去抢牛、抢驴，百姓痛骂他们为“拉驴队”“遭殃军”。

1938年4月的一天，国民党十三团郭锦章部的胡铭宇带着一队人马，闯进刘家庄，四处抢掠，把村里的牲口和贵重物品抢掠一空，还枪杀了村民刘西池，绑走了20多个村民。从此，刘家庄就再无宁日。

1939年，日寇把魔掌伸向了诸城西部一带，在贾悦镇的宋戈庄设立了据点，修工事，筑碉堡，四处

抓劳工、征民夫，抢劫掳掠，横征暴敛。地主武装纷纷投敌当了汉奸，胡铭宇、韩卓章、高理南、孙汝明（绰号“小老批”）、郑志祥等“十二旅”“十三团”以及“新兵连”，遍地土匪蜂起，汉奸顽匪多如牛毛。他们争占地盘，抢夺民财，不是今天你来要捐就是明天他来派粮，白天抓丁拉夫，夜晚抢劫绑票，若是交不上捐税，他们就把人架走，要百姓拿钱去赎，弄得户户倾家荡产。

日寇纠合着汉奸，三日一“扫荡”，二日一“清乡”，所到之处实行“三光”政策。百姓不得已都背乡离井，四处逃荒，许多村庄变成了废墟、瓦砾场，荒无人烟。1940年到1945年，位于诸城西北部的贾悦、程戈庄和箭口三乡镇交界地区尤为惨重，老百姓死的死，逃的逃，形成了方圆10多公里的“无人区”。